

耿剑著



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培育点 江苏省重点学科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
教学·科研·创作研究丛书

步履蹒跚

——我的佛教美术研究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培育点 江苏省重点学科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教学、科研、创作研究丛书

步履蹒跚

——我的佛教美术研究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步履蹒跚:我的佛教美术研究 / 耿剑著. — 南京:江苏
美术出版社, 2007.8
(教学 科研 创作研究丛书)
ISBN 978-7-5344-2444-1

I. 步… II. 耿… III. 美术-教学研究-高等学校-
文集 IV. J-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7845 号

责任编辑 周海歌 刘信步
责任校对 刁海裕
责任监印 贲 炜

书 名	步履蹒跚—我的佛教美术研究
著 者	耿 剑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制 版	南京台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南京台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总 印 张	87.375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2444-1
总 定 价	952 元(共 14 册)

营销部电话 025-83248515 83245159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13 楼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耿 剑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

前言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是国内首批美术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及江苏省优秀重点学科。

自建校以来，本学科曾经聚集了刘海粟、张大千、黄宾虹、潘玉良、陈之佛、朱屺瞻、吕凤子、丰子恺、俞剑华、关良、潘天寿、郑午昌、倪怡德、傅雷、谢海燕、颜文樑、吕斯百、蒋兆和、常书鸿、刘汝醴、陈大羽等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家、美术教育家和艺术理论家在这里任教。

在近一个世纪的办学历程中，本学科秉承“闳约深美”的教育理念，在积极倡导创新精神与务实学风的同时，始终注重将理论与创作研究交融贯通；将科研与教学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兼容并包”和“不息变动”的学术风气，在教学、科研与创作方面具有比较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鲜明的综合性特色。

经过几代南艺人的不懈努力，自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本学科已经发展成中国画、油画、版画、壁画、书法、雕塑、美术史论和造型基础等系部齐全、专业型与综合型美术人才培养并重的教学、科研实体。

本学科历来重视学科建设，坚持“正学风、促交流、推骨干、创品牌、严管理、出人才”的治学方略，在师资建设、学术研究、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本学科绘画与美术学专业在国内同类型院校教学、科研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和比较广泛的影响力。

本系列丛书旨在检阅本学科各专业教师在教学、科研与创作研究方面的综合性成果，并藉此体现理论与创作研究相结合的学术指向和科研特色，从而促进本学科各专业教学、科研与创作研究的对外交流以及自身的不断发展。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
2005年7月于黄瓜园

陈鹤良

目 录

佛教刻经研究

论佛教刻经书法源流及其艺术风格	1
太原风洞《华严经》书法初探	51
论房山云居寺刻经的艺术风格	56

以禅论画研究

禅画与以禅论画的概念	68
“以禅论画”基础研究	77
“于相离相”与绘画“形神”问题	94
“渐”、“顿”之悟与绘画灵感	115
“非空非有”与空白理论	123
南北分宗的分类品评方式	133

犍陀罗和克孜尔的佛传图像

部分佛传经典的初步研究	148
定光佛与“定光佛授记”	
——犍陀罗与克孜尔定光佛造像的比较研究 ...	170
释迦诞生、七步宣言与二(九)龙灌浴	
——犍陀罗浮雕与克孜尔壁画佛传组图比较研究 ...	193
图像“树下观耕”思惟与禅定	
——犍陀罗与克孜尔相关图像比较谈	205
刘草人布施与准备菩提座	221

编译及其它

扎德里遗址的重大发现	232
山西长子县法兴寺圆觉殿彩塑研究	243
王履的绘画思想	250

后记	265
----------	-----

论佛教刻经书法源流 及其艺术风格

内容提要:本文从探讨佛经书法的几个概念入手,重点研究佛教刻经书法产生、发展和艺术风格。试图通过对文化、宗教、历史等因素的初步分析,论证书法艺术的发展既受外界的条件制约,又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提出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产物的佛经书法同整个书法艺术的发展一样,是写与刻双线发展机制下产物的观点。认为佛经书法的共同性在于内容的一致性,运笔的力度小,这与书写者的观念与信仰相关联。文章将佛教刻经与历史上其它镌刻作品进行纵横比较,并与佛教写经对比,分析异同,加以定位。

论文将佛教刻经作了大致分期:早期及过渡期(北魏至北齐),盛期(北齐至北周),中期(隋至唐末),晚期(宋辽至明清),并对各期刻经风格特点概括分析。

关键词:佛教刻经 写经 佛经书法

绪论

佛教刻经,顾名思义,是将佛教典籍刻于石上或其他硬质材料之上的兼有布教功能的书法艺术创作,是整个书法艺术中的一部分,可称之为佛经书法,除刻经而外,相应还有写经。

为什么要将佛教刻经书法单立题目进行研究?这个问题涉及书法艺术基础理论的一些问题。佛教刻经作为整个书法艺术的一部分,对它进行研究,希望能够从一个侧面或者一个局部反映一些书法艺术及书法史的基本问题。如书法史的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点、书法艺术的规律等。仅从构成书法作品的基本要素:书写者、书写工具、书法语言、书法内容等几个方面看,佛经书法不同于其他书法的,主要是内容和书写者的不同,最显著的是书法内容的不同。书法内容包括两方面含义,即字体内容和文章内容。字体内容为不同风格、不同情趣、不同书体的文字;文章内容是指由文字组成的篇章意义。文章内容是区别佛经书法和其他书法的基本依据之一。佛经书法作品中的风格、情趣、神采等方面表现出的独特个性,以及作品的文化内涵、历史背景等,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佛教刻经是佛经书法中的一部分。限于篇幅,本文仅以佛教刻经中石刻部分作为主要研究、分析的对象。

有关佛教刻经的几个概念

如前所述,佛经书法即是以佛教经典为篇章内容的书法。它包括写经、刻经两部分内容。写经,是指魏晋以来,为传播佛教教义,手工抄写的经文;以职业抄经手的作品为主,也包括文人的案头之作。刻经,包括石刻佛经和木刻佛经两大类。石刻佛经,主要是指北朝以来,为保藏经本,弘扬佛法而镌刻在石窟壁面或碑版、石柱等石质材料之上的佛经;木版刻经主要是指印刷术发明以后,为印刷经本而雕凿的木版佛经及其印本。专事抄写经文的抄经手又叫“经生”,经生以抄写经文为生,职业所需,他们创造了一种书写快捷、清晰、易于认读的带有隶意,或

纯以楷意的小楷字体,俗称“经生体”。经生体的产生,对丰富书法的艺术语言具有重要的意义。经生体笔法,构成了小楷笔法的部分内容。而以这种小楷笔法,或者说以经生体笔法创作的大字,别有趣味。很大一部分刻经,包括摩崖刻经,参用了经生体的笔法,从而形成了佛经书法较为独特的艺术风格。

研究佛教刻经的意义

我国的佛教刻经,从北魏开始,经唐宋元,直到明清,纵跨千余年;大江南北、黄河流域及少数民族地区,凡是佛教波及的地方都留下大量刻经遗存,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部分刻经如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刻大藏经,从产生、发展到结束,经历了几个朝代。这使得佛教刻经构成了中国书法史上一个巨大的群体。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参与创作者之众,世所罕见。从书写内容到艺术形式、书法风格上,都有相对的特点,但是从书法理论研究上,对佛教刻经的研究,还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古代书论对刻经书法的论述多为零散的、随感式的,缺少系统性。王学仲先生《论碑、帖、经书分三派说》,将佛经书法的地位提到了重要的地位。^[1] 也为佛经书法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刻经渊源

宗教与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两种不同反映,它们以不同方式作用于人类社会,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有时,它们相互结合,融为一体。佛教刻经这一形式即是印度传来、译成汉语的佛教经文与中国本土的书法艺术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宗教艺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佛教与书法艺术结合的产物。

1.1 契刻传统

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文字的出现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记录和保存文字的方法,各民族祖先各出奇招。古印度人将文字用树枝写在棕榈叶上;古巴比伦人用泥板;古埃及人用纸草;古罗马人用蜡板;小亚细亚人用羊皮,^[2]而中国人的祖先大量使用了龟甲、兽骨等。此外,还有陶器、金石、简牍和绢帛等。所有这些用于记录文字的物品,保存最久的,是甲骨和金石。保存下来文字最久且字数最多的记录方式是镌刻,如甲骨文、秦刻石等。镌刻文字与书写文字相互借鉴,使汉字的线条不断丰富,逐渐形成一门以线条为表现手段的具有东方哲理意味的书法艺术。古老的中国书法是汉字佛教刻经艺术产生的母体。

佛教刻经的书法方式主要是书丹、镌刻。一般先由书写者书丹于石,然后由刻工镌刻。镌刻之不同于镌刻在于镌刻基本以刀代笔,直接刻出,一次完成,或者虽有预写字形,只作参照。镌刻的线条是纯刀味的线条,如早期的甲骨文。而镌刻是要严格遵照书写者的笔迹运刀。因此,镌刻文字的特点是笔意的线条,或者是刀笔互见,即富有“金石气”的线条。佛教刻经对石刻作品中刀凿趣味的探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早期镌刻、镌刻作品风格质朴。如甲骨文的刻制,有的是先书后刻,有的是刻后涂朱。但文字多是尖起尖落,转折处多比较生硬,或以两尖衔接。^[3](如图 1A、B)这些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不仅证明了殷商、西周时期文字的高度发展,同时,也反映了文字书写及契刻的艺术水平。均匀的线条,对称的结字以及纵式的分行布白章法,都成了后世书法美的滥觞,也丰富了岩画以来的镌刻传

统。

金文的铸造是青铜礼器,也是重器的附属物,因此又被称作钟鼎文。这种文字一般经过制范、翻铸两次完成,(也有直接刀凿完成的)。礼器功能的严肃性导致制作工艺的特殊性。金文具有很强的装饰感。结体更严谨,布白更整齐,线条更圆润饱满,文字大小更趋平均。雄浑凝重的风格丰富了书法美的内容,为书写、镌刻树立了风范。

相对于镌刻龟甲和兽骨,相对于铸造青铜礼器上的铭文,勒石纪事似乎是较为简便易行。因为石料取材广泛,不易毁坏。然而,专为纪事而大规模地刻石却是从先秦开始的。这也许是因为历史进入了铁器时代,铜铁提供了凿石刻字的便利工具的缘故。被称作“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的《石鼓文》,作为最早石刻文字的代表,可说是刻经的鼻祖。的确如历来评论家所称颂的那样,《石鼓文》朴茂自然,雄强浑厚,用笔圆劲挺拔,圆中见方,字距行距开阔均衡,疏朗若晴空星月。其优良传统在后世刻经中得到发扬光大。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巡视天下,勒铭纪功,刻石有六。至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刻石书迹因用途的不同或者形制上的差异,种类逐渐丰富。如碑刻、摩崖、石阙。东汉以后,墓志铭、造像记、塔铭、经幢等先后出现。

从史前先民遗留下来的岩画、陶器上刻画的符号文字到殷商的甲骨文,从铸刻于青铜器上的铭文到被称为刻石第一的石鼓文,再到秦始皇刻石、汉魏石经等,刻字活动与写字活动一道,并列组成中国书法创作史的全部。

将文字刻诸硬物,一来保存了文字,二来刻字活动本身对字体是一个美化过程,促进了字体和字形的完善和

发展。

佛教在传来中国五百年后,历经磨难。刻经是信徒们选定的一种保藏经文的较为妥善的方法。与此同时,借助于书法的形式,佛教刻经也为书法艺术拓宽了领域,丰富了书法艺术的语言和表现力。

1.2 佛教传入

佛教刻经的父体——印度佛教,早在东汉前期就已经传入中国。到了魏晋南北朝,更有了它生根发芽的社会土壤。统治阶级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对佛教大加提倡并在经济上予以大力资助。于是佛教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

佛教既是一种域外文化,它的大规模进入势必对汉地文化产生一种强大的冲击力,而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儒道哲学等,早已根深蒂固。这是一个域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撞,不断融合的过程。汉代佛教带有浓重的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的色彩。当时佛教与黄老并称,人们把佛陀只是作为祈福永命和祭祀的形式加以信奉。西晋时代,佛教由重斋戒趋向义解。到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达到长久统治的目的,北朝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儒学作为统治人们道德伦理的规范,另一方面力倡佛教,“唯佛一道,是为正道……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既邪,不能革凡成圣,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为正。”^[4]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艺术也一并来到中国生根开花。佛教素以“像教”名世,大量的佛教雕塑、绘画传入;刻经艺术品因佛教而产生,因佛教而保存。也就是说佛教主要用艺术形式来宣传教义,在中国,又必须采取中华民族固有的艺术形式才能被中国人所接受。在这个意义上,无疑佛教的传入对我国的艺术事业的发展有着

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千百年来,佛教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与儒道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及性格特征的基础。

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统治者大力提倡的佛教文化显然带有统治文化的意味。这种强制的推行,加速了佛教自西向东的浸透,一直深入到儒家诞生地孔孟之乡。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播,也是一种文化的占领,意味着异域的佛教占领了东部儒家的圣地,以及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皇权统治。也正是在这片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佛教与书法浑成一体,诞生了佛经书法的优秀代表——山东邹县的“四山摩崖刻经”。至此,佛经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继写经之后,进一步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佛教的传入,曾给中国古代绘画、雕塑、建筑等带来新的题材,新的技法以及新的形式等。那么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书法带来了什么呢?没有现成的形式、技法可以借鉴。但是,全新的观念和文辞皆美、汗牛充栋的佛经典籍成为写之不尽的文字内容。而佛经典籍中的审美境界给了书法以很大影响。

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随着佛教文化的不断渗入,佛家的审美境界使书法艺术间接受其浸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佛教传入使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不再纯粹。取而代之的是生动活泼的文化多元发展。书法艺术作为一门特殊的艺术被自觉甚至是刻苦地钻研探求。这一时期,风格多样,异彩纷呈。那些至今广为流行的各种书体,如行、草、楷书等的规范,基本都是当时创立完善的。以往,人们把魏晋南北朝作为艺术走向自觉的时期,书法一般以“二王”作为“走向自觉”的代表。而佛

教刻经,尤其是摩崖刻经对书法所作的自觉探索,却很少引起学界的注意。

1.3 刻经肇始

佛教东来以后,一项重要的事业就是佛经的翻译。随着经典的译出,抄写经文即成为一项颇费人力的工作。在当时没有印刷条件的情况下,写经成为传播佛经的主要方式之一。各大小寺院均以抄写经本贮藏佛经。由于对经本的大量需求,遂使写经成为一种职业。从事写经职业的人被称作“经生”。职业经生所用的书体叫“经生体”。^[5]如前所述,写经是佛经书法的一部分。如果说,佛教写经是由于传播佛经的需要应运而生,没有非常复杂的背景,而佛教刻经的发生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1、儒家刻经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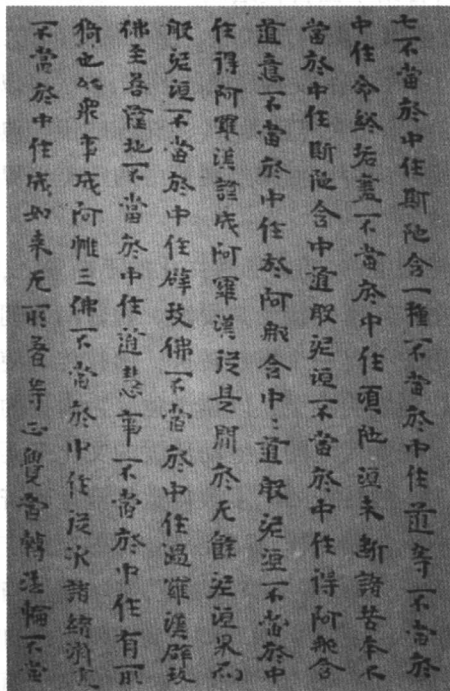


图 1(A) ..

晋人写经《放光般若经卷六》(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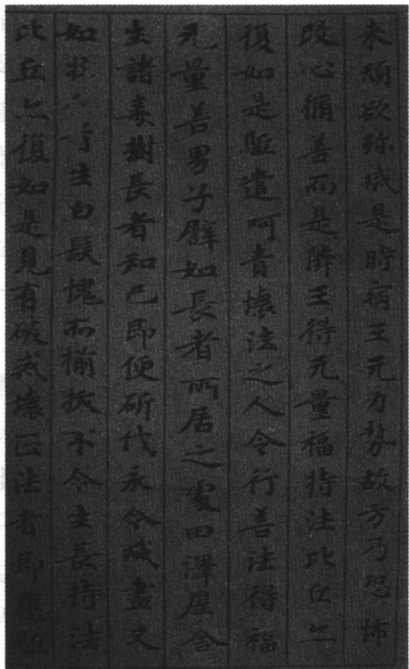


图 1(B) :
唐人写经《大般若涅槃经》卷第三《选页》

自东汉初年,汉灵帝命蔡邕书丹立石、刻五经以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所谓“今古文经之争”;其后,又有魏正始石经,也叫三体石经。刻经之举,于弘扬儒学、保存经文的影响及意义颇为深远。

2、“末法佛教”论

南北朝时期佛学界流行“佛法三时论”,所谓“三时”,佛教认为是释迦牟尼逝世后佛法日益衰微,分为正法、像法和末法三个时期:“佛灭度后,法有三时。谓正、像、末。具教、行、证三,名为正法;但有教、行,名为像法;有教无余,名为末法。”^[6]当时佛教界认为末法已到。

3、“灭佛”事件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期间,爆发了以盖吴为首的中原各民族人民反抗拓跋氏残暴统治的较大规模的起义。太

武帝西伐盖吴返回至长安时，偶于寺中发现藏有弓、矢、矛、盾等兵器。又见州郡牧守与富豪寄存财务以及藏匿妇女的密室。太武帝先前也曾好佛，却又非常亲近道教天师寇谦之，信用道教徒崔浩等，常常听闻他们的毁佛之论。又逢经历盖吴之乱，至此不啻火上浇油。于是下达诏书：“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宫以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又说“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¹⁷太子晃曾多次上表阻拦未果。但终使诏书宣布延缓，消息走漏。远近沙门多方逃匿。只是“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太武帝此举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儒道联合反佛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紧张气氛持续了七八年之久。¹⁸灭佛事件使得佛家弟子对经文的保存产生忧惧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刻经的产生是不难理解的。见诸文献记载的较早的佛教刻经有以下几种：

《增一阿含·结禁品》，北凉承玄元年（公元 428 年）（现存北凉石塔中，有十二座塔上刻有经文）。

《教戒经》，全称《佛垂般涅槃略说佛教戒经》。后魏顺思王书，未详。¹⁹

《心经》，全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洛阳龙门石窟莲花洞内。刻于北魏晚期。

《大般若涅槃经偈》。北魏刻。原在山东济南千佛山黄石崖，后归潘祖荫。今佚。经高 38 厘米，宽 41 厘米，正书。像高 42 厘米，宽 19 厘米。此拓本有陆和九戊子冬月题跋一款。款文题在刻经拓片一侧。

（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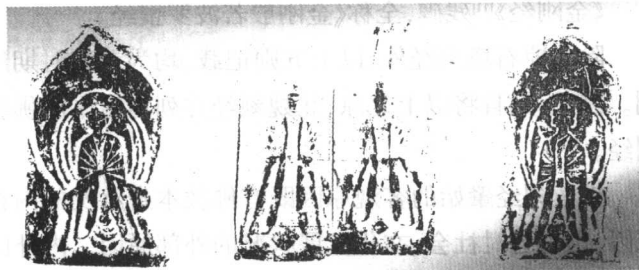


图 2A:大般若涅槃经偈并造像四龕(A)造像拓片, 国家图书馆(善 411-1)收藏

大般若涅槃经偈并造像四龕(A):北魏刻。原在山东济南黄石崖,后归潘祖荫。今佚。像高 42 厘米,宽 19 厘米。



图 2B:大般若涅槃经偈并造像四龕(B)刻经拓片, 国家图书馆(善 411-1)收藏

大般若涅槃经偈并造像四龕(B):经高 38 厘米,宽 41 厘米,正书。此拓本有陆和九戊子冬月题跋一款。

《阿弥陀佛》: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 450 年)刻。^[10]